

# 中国式博士淘汰制该如何实行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在中国跃升为第二博士培养大国之时,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博士,质量该如何保证?

作为第一博士大国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申请博士资格的学生众多,但入学后约40%的人最终拿不到博士学位。而在中国,无论是通过博士统一考试、各种免推政策入学的博士生,95%以上的人都能拿到博士学位。悬殊的比率背后,直接关乎博士教育质量高下。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三大部委下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畅通分流渠道,加大淘汰力度。

尽管意见的初衷、方向无误,但在操作层面上却并不太容易实现。

## 不顺畅的直博转硕

中国也有博士淘汰。早在2006年,南开大学28名博士生因攻读学位时间超9年被淘汰,打破了我国博士生“零淘汰率”。之后,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也有同样的举动。这些淘汰者都是以学习研究时间过长为理由,被淘汰者中以在职博士生居多。

放眼国内高校,完全能以学术水平不高之名劝退博士生的情况少之又少。而另一种淘汰方式更为常见,如果学生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在读博期间又无法达到其培养要求,则可以以硕士身份毕业。学术界称之为分流。

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做科研的天赋,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直博生陈意想走直博转硕之路。可当年冲动直博的代价是,此时要求转硕,只能拿到博士肄业证和硕士学位证。

更加让他气愤的是,同是直博转硕,北大、清华、浙大等学校却可以拿到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拿不到毕业证,派遣就可能成为问题,也意味着户口可能需要回到原籍地。”陈意说。

事实上,陈意遇到的情况更多地存在于国内直博制度实行的早年,为了避免博士生大批转硕,高校一般都严禁直博转硕。然而,2012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立退出机制,开通分流通道,允许试点学院将符合条件的直博生分流转为硕士生培养。很显然,陈意所在的学校要么在试点之外,要么是缺乏相应的培养理念和制度基础。

从最初的“不允许”到政策上打通,实现直博转硕的过程也并非容易。由于审批直博转硕的程序较长,清华大学直博生小文一直挨到博士毕业,也没有等来转硕申请成功的通知,莫名其妙地以博士身份毕业了。这让他哭笑不得。

## 遭遇中国式尴尬

美国四个计算机系并列第一的高校——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人有两条路:转为硕士,2至3年毕业,进入工业界;也有人主动退学,比如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斯坦福大学退学创业的博士生。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成熟的直博转硕制度,来到中国却有各种问题?

“国内目前缺少也最为关键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专家建议,中期考核要加大难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直博转硕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想当然地考虑,必须结合社会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学生转硕之后的权利、前途发展。”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问题的根本不只是涉及教育,其实教育也是被困在其中。”北京某“985工程”高校教师王军说。当中涉及户口和档案两个因素,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独有的,需要相关地方管理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

而从教育管理的层面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胡世民表示,当前博转硕的主要难度在于学生的学籍改变在政策上是允许的,但一般学校每年只受理两次,得先报省市教委审批,再报教育部,时间拖得较长。正是由于“麻烦”,很多高校干脆不允许直博转硕。

制度上的不顺畅是影响直博转硕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社会文化心理。陈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内高校、研究所很少有博士生淘汰,读博失败在社会认知层面意味着女朋友、家长、求职单位,甚至导师、同门都会用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这也是作出直博转硕决定时,他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

导师也会“受伤”。直博生占博士生招生名额,招一名学术理想不足的学生,等于浪费了另一名学生的机会。当然,比起让学生苦熬博士,指标问题还只是一件小事。

## 如何利用直博转硕建立淘汰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直博转硕,建立可行的博士生淘汰制度。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举例,国外某大学的做法是设置难度极高的中期考核,难到几乎没有学生能回答得上来,收卷后导师们讨论诸位学生的学术前途,会给公认没有学术前途的学生打低分,这样被淘汰的学生也会服气,因为他本来的分数就不高。

“真正的博士生淘汰机制的核心原则,不是入学年限问题,不是中期考核的考试内容,而是要看这个博士生是否有可能为人类知识库增加新内容,学术上能否真正创新。这是唯一的学术标准。”卢晓东说,“创新能力”的考查很难用固定的指标、数据量化,虽然上述国外某大学的逻辑听起来有些与常识不一样,但是导师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所作出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国内目前缺少也最为关键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胡世民、卢晓东建议,中期考核要加大难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如果每个学院规定中期考核的淘汰比例为20%,如招24名直博生,中期考核成绩最后不过关的4人通过直博转硕等方式分流,不仅有助于保证博士生的整体质量,导师在操作时也更容易开展。

记者了解到,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正在试行固定比例的博士生淘汰制,但在全国范围的直博院校尚没有大规模

开展。

此外,在直博转硕的过程中,导师也要转变观念。卢晓东表示,博士生研究阶段培养费用加大,让不合格的人参与真正的科研工作,对于导师和国家而言才是真正的浪费——费钱、费力、费时。

“如果后备生源充足,让不合格的学生以硕士生的身份毕业反而可以用活指标。”他解释,淘汰不合格博士以后,指标可以从本校硕士生或者从其他高校硕士生中进行补充,这盘棋就能活起来了。“这些在制度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王军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如果本学期间淘汰3个学生,下一年度教育部给予相应的指标补充,相信导师会愿意考虑淘汰事宜。

## 淘汰制可行性有多大

然而,在一个“面子治学”的氛围下,利用直博转硕建立起的提高中期考核难度、按比例淘汰制度,可行性又有多大?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敦荣指出,博士生淘汰制中师生双方就转硕或退学等选择达成双向选择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我国,只要学生不答应淘汰就实行不了。

他解释,美国的博士生入学采用审核制,根据学生所提交的文字材料确定他是否有入学资格,入学后修课,然后再通过中期的资格考试选拔最终进入论文阶段的人选;而中国的硕士、博士均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选拔(直博生也要参加校内选拔),如果中期再进行一次选拔,“相当于先用筛子、再用一次细筛子挑选,太过复杂。”“在中国的当下,‘拿到学位便是成功,分流就意味着失败’的心理盛行,过多的选拔易引发学生产生极端心理,比如学生以自残的方式要求导师不淘汰自己,导师也只能无奈放过。”

事实上,在我国经过选拔而来的生源,教育部门、高校也难以说出“淘汰”二字,而改换成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制度。卢晓东举例,南开要求博士生毕业必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北大经济学院引入博士论文匿名评审都曾遭遇过较大的波澜,“但这目前却是中国特色研究生培养制度中必须发生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导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不好意思说出‘淘汰’和‘不合格’,只能以这样的制度有限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

在别敦荣看来,直博转硕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想当然地考虑,必须结合社会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学生转硕之后的权利、前途发展。现在直博转硕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意味着一无所有;而对另一些学生来说,他们会认为是一条出路。只有当后者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直博转硕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为此,他建议,更应该注重进入直博通道时生源的甄别,而非等学生入学后,中期再去淘汰、分流。直博选拔对本校学生的学术功底、研究能力、学术兴趣以及学生自身的不足和问题,要有明确具体的考核;校外生源则可以通过前期的高校夏令营、科研项目等形式,结合该生的科研经历,检验学生的学术基础和创新意识。(部分被采访者化名)

# 高校里的艺术之光

## ——记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特色人才培养

■本报通讯员 余敏

2007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自己举办的第一场毕业典礼上,该院院长龙全骄傲地谈到:“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叫出全院毕业生名字的院长。”当时学院共有60余名毕业生。

今天,或许龙全已叫不出每位毕业生的名字,但是每一位与学生最亲近的老师依然秉承了这个传统——记住每一位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爱护每一位学生,“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于2006年10月在原北航计算机学院新媒体艺术系(2002年开始招生)的基础上成立。“新媒体”对于学院来说是一个专业概念,有学科自身追求的目标;然而,对于北航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还是大学学科生态的需要,是大学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小而精”定位+“大美术”理念

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而对于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的毕业生们来说,一切却是水到渠成。从一个单位数百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什么让他们得到了就业单位的青睐?

在与毕业生马腾飞就业单位招聘主管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正是他跨专业的综合能力拔得头筹,获得UI设计的高薪职位。“和传统艺术设计院的毕业生不一样,马腾飞不仅会美工设计,会手绘制图,还会动画视频剪辑。”招聘主管说。

马腾飞的情况不是个案,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今年的毕业生中,除了一部分毕业生像

陈雪燃赴美国伯克利学院继续深造之外,其他的学生在就业上也有较宽的选择和发展。

和很多艺术设计院校的扩招不一样,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确定了“小而精”的基本定位。“在学校精品文科战略下,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四个精字:‘精特色,精环境,精师资,精培养’,重点落在‘精培养’上,质量才是硬道理。”龙全说。既然小,就要精。学院这几年的本科招生规模都控制在60人以内,生源文化课最低都在400分以上,师生比例达到了1:9。和同类的艺术学科相比,学生享受的教学资源要比一般学校多很多。

对于艺术教育,一般的工科院校往往根据市场需求只是建立艺术设计专业,涉及的领域单一而固定,这对人才培养不利。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在与计算机专业交叉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特色方向。“坚持‘大美术’理念,美术、设计不分家,充分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龙全强调,“这是北航大环境给予我们的启示。”

新媒体特色代表了艺术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是较早打出新媒体旗号的院系之一。绘画系、数字动画艺术系和视觉传达设计系,虽然三个系专业不同,但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网络传播综合艺术设计方向努力。

##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在面向该院2011级学生的专业选择宣讲会上,绘画系主任谷久文、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王可、数字动画艺术系系主任任水像是一场

拉票演讲一样,介绍了各专业的教学方向、学习课程、师资状况以及未来的就业情况,试图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各自团队。

据悉,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本科生培养前两年是不分专业的基础课学习,而在大二下学期,学院开设了带有三个专业方向性质的课程。到了大三、大四,学院还设置了三个不同专业方向的选修课,供每位同学选择学习。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的毕业生能一专多能,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11年来,我们坚持了这一点,不对学生作任何限制。虽然给管理带来了不便,但是让管理和教学去适应学生的自主选择,也是我们教育的一大特色。”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院长叶强说。

不仅课程设置是跨专业的,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全院共二十几位老师,也分别来自十几个专业。“这样的教师结构做出来的‘菜’,要比传统艺术学院的丰富得多。”龙全说,传统的艺术院校师资专业的一元结构,不利于拓展教学改革,更无法实现需要多学科交叉的新媒体特色;而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具有十分多元的专业结构特点,这也是从事教学创新和改革的基础优势。

据介绍,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毕业生可以面对不同专业领域的工作选择,从事影视动画、平面设计、插图与书籍设计与网络传播有关的综合艺术创作与设计工作。

## 用艺术培养创新思维

北航校长怀进鹏曾说,具有想象力和文化

艺术氛围的大学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才能取得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与创造。

《艺术让人成为人》、《像艺术家一样去思考》,这是新媒体艺术及设计学院老师在给学校文科实验班开设的“艺术史与现代艺术”第一节概况课上必提到的两本书。开课老师希望通过艺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的艺术感觉,以更高层次地培养其创作型思维。

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开设的艺术史论类课程非常受欢迎,其原因在于创作型老师讲授史论,观点与讲授方式都较为独特、新颖,能被非艺术专业学生所接受。迄今为止,学院为文科实验班授课已有三届。

据介绍,北航“博雅课堂”是通识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艺术及设计学院则承担了其中“文化与审美”内容的授课任务。

北航创意设计馆的二楼教室将用于开设面向非艺术类专业学生的艺术工作坊。工作坊是艺术教育最初的方式,也是至今被认为最理想的教学方式。“在全校范围内,我们希望在创造力培养方面发挥艺术学科的作用,比如培养理工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艺术实践教学。不仅仅是史论、欣赏一类的选修课,还要动手进行创作实践,以培养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龙全说。

“建环境、建氛围、建机制”正是新媒体艺术与视觉设计学院努力编织的“梦”。今天,当人们再次走进北航艺术馆,看到的是大学生在四载求学时光中努力的成果:北航风光明信片、手绘北航地图以及首名在校开演唱会的本科生陈雪燃的音乐CD,更加感受到北航学子们的创意与风采。

## 中国大学评论

# 项目衍生物影响科研生态

■尤小立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前执行院长、水环境研究院前院长陈英旭涉嫌贪污和非法占有十万元科研经费被检察机关起诉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在大学和整个科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从学者的反应看,经常获得科研项目资助者,不论出于本能,还是利益攸关,都不自觉地捂紧了口袋,但他们更多地仍是从合理的一面去看待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科研基金的发放,因而少了一份反省。而没有获得项目资助者,则趁此机会谴责项目基金申报、发放和鉴定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结果很可能在谴责中失去理性。

谈项目申报本身的问题,牵涉制度和机制,说来话长,暂时按下不表。此处仅想说,大家习以为常的,与科研项目相关的所谓衍生物的问题。也许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地还原项目设立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原貌。

做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科研本身是单纯的,如果以此单纯标准诉诸于基金项目的申报,并不会产生多大的不公和矛盾。然而在当下,这个单纯性早已不复存在,原来裁分两截的科研与行政、科研与公关、科研与经营,正在合二为一,或合几为一。所谓与科研项目相关的衍生物,也正是这种“大合唱”的产物。

第一个衍生物是:项目通吃。应该说,早年的科研项目申报和获得过程中并无此现象,近十年来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些大学里,一位教师一旦申报成功,获得一项国家级项目,不仅会得到相应的经费配套奖励,而且在提拔任用、职称晋升、社会兼职等方面也会一路牛市。

客观地说,科研项目,特别是前沿领域的科研项目的鉴定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学术共同体尚待形成,同行评议缺乏机制保障的情况下,要以学术标准来判别人众多有一定学术水平却无实质创新的学术成果,则是难上加难;但再难也不能在申报人尚未完成项目的研究,没有得到哪怕是简单或程式化的鉴定结论之前,就先认定他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情况。假设一个人获得了一百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另一个人受助了一万元的科研经费,或根本未获资助,但他们作出的成果,在科学性、前瞻性和实用创新性上都相差无几,其中科研能力和水平高下,应该怎么评定?从常识上看,当然是后者更有能力和水平,更值得欣赏,更应获得奖励。但依据“项目通吃”的标准,荣誉、奖励却要统统地归前者,原因仅仅是他获得资助的经费多。通过这一对比,不难看出,“项目通吃”这个衍生物以及它再衍生出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违反常识的。

第二个衍生物是:项目排名化。既然获得科研基金的目的,不再纯粹是为了资助科学研究,它就必然附着了另外的功能,这个功能在某程度上,还会超越科学研究本身,比如为了本校的排名。

现如今,没有哪所大学会欣然承认“大学排行榜”的功能和价值,视之如粪土的话语也偶尔出现过,但实际上,暗中关注排名波动的大学不在少数。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中,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数量恰是重要的一项。在相互竞争和排名攀比中,量化的指标愈发简单明了,所有的数据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字:钱。

“钱”对于大学办学的重要性,无须多言。但在大学教育普遍缺乏符合教育规律的理念指导的现状下,整天紧盯“钱”,大会、小会地强调,其结果必然是金钱高于一切,有钱就得洋洋,没钱就灰头土脸。这只能使中国大学进一步地公司化。

第三个衍生物是:申报技术化。我们不否认项目申报的过程中,包括填写申请表的方式、科学论证的过程、设计课题的技术路线以及预计最终成果都有一定的科学规范,了解这些科学规范也确实需要培训。项目申报者通过相应的技巧获得基金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申报技术化”与此无关,与项目申报有关的“辅导”或“培训”不再是规范性的告知和规则的提醒,其内容正在脱离项目本身,而更多地涉及项目内容以外的技术、内幕、公关手段以及如何利用潜规则等,因而成为新的一类抄近路、走小道的“成功学”课程。这种近似专注于厚黑学的技术化的申报方式,即便能够导向“成功”,也不值得赞赏和推广,因为它已经越过了科学道德的底线。

当然,上述衍生物并不是科研项目或项目基金设立直接引发的,所以也不必把它的产生归罪于项目申报或基金的设立。但应该看到,这些衍生物绝不会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古典哲理和诗意,如果听任这些衍生物无限地蔓延下去,不仅会无谓地浪费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使中国的科研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还会影响到中国科学研究的实质性提升以及国际科学界的中国形象。